

# 略论辽代文学及文化制度

胡淑慧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长期占据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北宋对峙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文化发展上同中原文化相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1)契丹族文人成为辽代文学的主体(2)契丹族祖先崇尚武功,无暇文事,但建国后的第二、第三代开始注重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辽代女作家表现突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政策的实施,辽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本民族文化,如:制定本民族文字,兴办州学、国子学,复兴科举制,以本民族文字翻译汉文书籍以及崇儒尊教等。

[关键词] 辽代;契丹族文人;主体;文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3-0072-06

辽国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族所建。从时间上来看,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立国至公元1125年天祚帝为金所俘,历时209年;从疆域来看,其国“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sup>①</sup>(p.438);从其境内属国来看,“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sup>②</sup>(p.429)。但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疆域辽阔、属国众多的游牧民族所建王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在文学史上却备受冷落。事实上,北宋自宋太祖960年陈桥兵变到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所掳,基本上与辽相伴始终,在时间上处于同一历史平台。宋辽虽然互相对峙,但处于南北多种民族文化碰撞、交流和融会的重要时期。要研究10世纪至11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不能忽略与北宋同时并存且又互相影响与交融的北方辽、金等国的民族文化。

辽代文献流传下来极少,这同其实行保守的文化政策有关。据《梦溪笔谈》记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sup>③</sup>(p.127)。又《辽史·道宗纪》载:“禁私刊印文字”<sup>④</sup>(p.264)。但辽代文学湮没无闻更重要的原因是后人缺少重视和发掘。如周春曾感叹:“辽自唐季基于朔方,虽地处北鄙,文墨非其所尚,然享年二百,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有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乐。东丹王倍聚书万卷,平王隆先著有《闾苑集》。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晖、耶律孟简,皆淹通风雅,特以诗传者罕。故无人焉为之援述绪言申译遗句耳。”<sup>⑤</sup>(p.2)他甚至说:“倘五京人物有如元遗山之徒出于其间,而博雅如耶律文正先时而生,则辽之文章词藻当必灿然可观。”<sup>⑥</sup>(p.1)本文即主要从辽代文学特征及其与文化制度的关系这一角度作一论述,以期更全面地认识辽代文学。

《辽史》无《艺文志》,著录辽一代著述的有清倪灿撰、卢文弨补《补辽金元艺文志》<sup>④</sup>,清金门诏

[收稿日期] 2004-04-0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胡淑慧(1976-),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和辽金元文学研究。

《补三史艺文志》<sup>[4]</sup>，繆荃孙《辽艺文志》<sup>[4]</sup>，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sup>[4]</sup>，清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sup>[4]</sup>，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sup>[5]</sup>，厉鹗《辽史拾遗》<sup>[6]</sup>，元脱脱所撰《辽史》<sup>[1]</sup>，陈述辑《全辽文》<sup>[7]</sup>及周春《辽诗话》等，从中大致可以了解辽代文学的总体面貌。清赵翼《廿二史劄记》<sup>[8]</sup>卷二七“辽族多好文学条”勾勒了契丹皇族爱好文学的盛况。可惜以契丹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作品历来缺少搜集整理，见于上述记载的也只是以汉文为载体的部分。因此，笔者在此根据这些材料总结出辽代契丹族文学的如下特征：

(1)代表辽代文学成就的为非汉族文人，他们占辽代作家中的大多数，构成了辽代文学的主体。其中以耶律和萧二姓的契丹族文人为主，也有少数赐姓耶律的汉族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其他族文人。从其著作所涉及门类来看，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学均有涉猎。契丹族立国之前并无文字，刻木为契，且用武得国，崇尚武力，可谓是文化蛮荒之地。然而不长时间内涌现众多文人且多有文集，不仅有汉文创作，亦用契丹文作出了相当成熟的诗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以现今所存的一首辽代寺公大师用契丹文创制的诗歌《醉义歌》（元初为耶律楚材译成汉文）为例，即可说明契丹之文学水平。耶律楚材在序中写道：“辽朝寺公大师，贤而能文，《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其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庶几形容其万一云。”<sup>[7] p.364</sup>从这首汉译诗歌来看，内容、形式成熟，且“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sup>[7] p.401</sup>。有辽一代，像这样的作品应该并不少见；“想见契丹一代以其国语撰造者，亦多斐然之作。”<sup>[7] p.364</sup>。

契丹从没有文字的文化原始状态，发展到产生众多文集且可以用本民族语言熟练地创造出“旨义精美”<sup>[7] p.364</sup>的传世作品，表明契丹族文人高超的文化学习能力和创新水平。

(2)契丹皇族祖先以武力得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权，但还无暇文治，与北宋和议以后，才逐渐注重文化的发展。他们对汉文化虽然表现出钦慕和提倡的态度，但缺少汉学修养。随着辽宋和平局面的进一步维持，出现了一批汉学修养较深的契丹族后代，这些契丹士大夫甚至可以和汉族文人一竞高低。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像耶律楚材这样的文坛豪杰就是凭借其本民族的文学素质，又在先辈一代代汉学教养的积淀下孕育出来的。这也证明了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了汉族文化以后，经过几代的努力完全可以领衔文坛，创造出新的文化潮流。

首先，从契丹皇族来看，耶律阿保机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但建国后也懂得发展文化及仿效汉制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他对中原儒学极为尊崇，“神册三年（918）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sup>[1] p.13</sup>把儒学、佛学、道学并行提出，为此后辽代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神册五年（920）春正月，始制契丹大字。”<sup>[1] p.16</sup>这是另一件对契丹文化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文字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字的创制在契丹历史上可谓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得契丹的文学、文化得以传承。再看耶律阿保机的后代，耶律倍为太祖长子，爱好儒学，在这一点上他同太祖有相同认识。据《辽史》记载：“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sup>[1] p.1209</sup>耶律倍可以作成熟的五言诗，也可以绘出精妙的水墨画，他仰慕汉学，名号仿效白居易，最后泛海投奔后唐。耶律倍子耶律隆绪亦能诗善画，他亲自以契丹文字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耶律隆绪长子耶律宗真、耶律洪基，均是精通汉学的儒家文人，辽道宗耶律洪基还有文集《清宁集》行世。辽国内其他族帐的后代也走着相同的道路，前一代用铁骑硝烟换来了辽阔江山，但维护统治需要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统治体系来支持，马上英雄的子嗣们也迅速地转换了角色，开始学习他们并不擅长的文治。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不长时间的发展，他们均作出了可观业绩。以出自仲父房、季父房的后代为例：耶律资忠出自仲父房，著有文集《西亭集》，其兄耶律国留著的《兔赋》、《寤寐赋》，为世所称；耶律庶成出自季父房，是辽代著名文学家，《辽史》有传，他擅长辽、汉文字，有诗文行于世；其弟耶律庶箴及子耶律蒲鲁，亦均为能诗善文的饱学之士。其次，契丹姻族的后

代亦有很多汉学修养较深之人,如萧柳和萧孝穆,二人均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分别著有文集《岁寒集》和《宝老集》。

总之,辽代文人中契丹文人是成就较为突出的一群,从他们的身份上、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上、共同的创作倾向上来说已经具有了群体的特征,其突出的表现成为研究辽代文学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现象。

(3)从保存下来的辽代诗文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女作家,如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常哥等。

萧观音,道宗宣懿皇后。“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sup>〔1〕p.1205</sup>。《全辽文》录其作品有《伏虎林应制》、《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谏猎疏》、《回心院》10首及《怀古诗》与《绝命词》。前三首为应制诗,同马背上民族所特有的豪迈襟怀相一致,展现出风气刚劲的一面,有不同于深受礼教束缚的中原女子的英姿飒爽的气概。最受人称道的是《回心院》10首及《绝命词》,这些作品作于后期,格调悲凉。《回心院》表现的是不得宠幸的委曲幽婉的弃妇情怀,词中熟练运用典故,表现出汉学修养较深的特点。《绝命词》则是萧观音被迫自尽前的作品,为自陈心迹之作。作者采用楚辞骚体的写法,表现出呼号惨痛的情绪状态。其中有对奸邪的斥责和自我的剖陈,“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有对遭受迫害的痛苦;“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有对天地不公的怨恨;“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也有催人泪下之凄婉,怨天责地之悲愤,还有听天由命之无奈,是一首感情充沛、情真意切的诗。

萧瑟瑟《全辽文》中录其诗两首《讽谏歌》和《咏史》。史载萧瑟瑟为“国舅大父房之女……善歌诗”<sup>〔1〕p.1206</sup>。《讽谏歌》为谏天祚帝所作。《辽史》记载:“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sup>〔1〕p.1206</sup>这首诗表现出契丹女性颇具见识和勇气的一面,她满怀激情地劝慰天祚帝不必为国事衰微哀伤,只要选取贤臣卧薪尝胆,一定可以肃清叛乱。另一首《咏史》亦表达了她对国事的担忧,直接昭显重小人远贤臣的恶果。两首诗写得直露而愤激,怪不得天祚帝要“见而衔之”了。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契丹女性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她们都被诬陷致死。另一位女作家耶律常哥的记载见于《辽史》:“太师适鲁之妹……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sup>〔1〕p.1472</sup>她亦被耶律乙辛诬陷,不过幸运的是“按无迹,获免”。《全辽文》录其《述时政文》一篇。此文论治国之策,陈述利害,简洁明快,流畅优美。

现今学界对契丹族女作家均有较高评价,认为“她们作品数量较多,体裁较为丰富”<sup>〔9〕p.53</sup>;从内容来看,亦表现出“高远的胸襟与强烈的政治意识”<sup>〔9〕p.53</sup>;从风格上来看,又“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女性的豪放”<sup>〔9〕p.53</sup>。辽亡后,契丹族文学传统并未中断。辽之后裔仕金并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虽不多,但在元代,契丹文学则是构成当时多民族文学汇聚的源流之一。

## 二

文学发展和文化政策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辽代从刻木纪事的较低文化水平发展到焕然可观的局面,从惟尚武功发展到接受中原儒学;“崇儒之美”<sup>〔1〕p.1445</sup>,进而获得文学上的独立创新,这种在短时期内跨越式的发展,同辽代实施的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制定本民族文字。“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sup>〔1〕p.16</sup>。契丹大字是在耶律阿保机的倡导下,由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以及一些汉族文人参照汉字创制而成的,为表意方块字。同时还有一种契丹小字。《辽史·皇子表》载:“回鹘史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选刺聪敏可使’,遣逐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sup>〔1〕p.968</sup>契丹小字是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剌参照汉字及契丹大字的字形并借用汉字的笔画创制的,属拼音文字。辽代立国初期,便创制了大、小两种文字,为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兴办州学、国子学 培养并教育本民族子弟。契丹族统治者认识到培养本民族子弟的重要性,大量借鉴和吸收中原汉族的办学经验,创办了为数众多、体制较为完善的教学机构。辽太祖时,即在上京置国子监,设国子学;及太宗在南京设太学,亦称南京学。道宗清宁五年(1059),又于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与南京学合称“五京学”;此外,“诸道州县皆设学”,终于形成辽代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的全盛局面。统和十三年(995)九月,辽圣宗“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碓庄一区”<sup>①</sup>(p.147)。

辽代重视对契丹族子弟的教育,公开表示要实现“设学养士”,这一广泛办学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涌现出许多有杰出才华的士人。如《辽史》记载:“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sup>②</sup>(p.1445);“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sup>③</sup>(p.1349);“耶律良‘读书医巫闾山’”<sup>④</sup>(p.1398),等等,都是辽代大力推行学校教育的成果。

辽代所推行的学校体制基本上仿制唐朝。据《辽史拾遗》载:“契丹初兴,惟尚武艺。燕赵间学校,俱仍唐旧,间罹兵祸,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是奋。”<sup>⑤</sup>(p.333)燕赵地区残留的学校、取士制度,辽并没有废除,相反还按照这种体制,大规模地开始培养本民族人才。学校以儒家经典和汉人史书为教材。因为契丹族文人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接受教育就少了汉族士子读书习文的功利性和限制性,有助于契丹文人在各个领域均能有所成就。

(3)科举制度的复兴对契丹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代科举仅适用于汉人,这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sup>⑥</sup>(p.685)国策的结果。汉人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做官,朝廷并以此选拔汉人官员,契丹族则通过世选参与政权。为了维护契丹族尚武习战的民族特性,辽代甚至以法令禁止本族青年参加科举。但是,随着形势变化,这条禁令逐渐失去了约束力。首先是契丹族青年有好的受教育环境,经过多年的文化攻习,具备了与汉族文人一竞高低的能力;其次,在和平环境中,用武参战的机会大大减少,国家需要能“治天下”的人才。以耶律蒲鲁为例,他本为乌衍突厥部节度使耶律庶箴之子,不需参加科考即可晋身,但“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sup>⑦</sup>(p.1351)。耶律蒲鲁的行为反映了契丹族文人要求借科举来表现才能和得到赏识的愿望。为汉族人所设的科举已为他们所认同,通过科举实现自身价值成为他们选择的途径,耶律蒲鲁的行为代表了一部分契丹青年的愿望。辽兴宗耶律宗真看过耶律蒲鲁的诗后,大为嘉赏。据《辽史》记载:“帝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转通进。”<sup>⑧</sup>(p.1351)这部分契丹族青年表现出身份的两重性:他们一方面是武士,保持了契丹民族尚武的特色和优势,同时又是文人,经国之策和诗词歌赋皆为其擅事。此后,契丹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就废除了。从兼通契丹字、汉字的皇族后代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1115)进士即可推测,这一法令业已废止。从禁止参与科举到允许应试,这是个提升本民族文化水平的过程,也为后来金、元两代科举制的兴立奠定了基础。

面对科举制的实施,原来置身事外的契丹文人并没有淡然处之,这不仅和科举制本身符合社会文化需要有关,更与辽代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大力扶植并把它作为笼络汉人的主要工具有关。整理一下科举制度在辽代的发展情况,不难理解契丹族文人要求参与科举的强烈呼声。如《契丹国志》载:“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sup>⑨</sup>(p.175)事实上,燕赵地区的科举从未废止。此类记录见于《辽史》也不在少数: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诏复南京礼部贡院;辽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圣宗即位49年间,放进士26次,最高一次达57人;辽兴宗统治16年内,取士次数较少,但每次均在50人以上,兴宗几乎每次都御试进士,这可能与他颇为精通和喜好汉文学有关;辽道宗期间,科举超越往昔规模,人数突破一百的就有四次;辽末天祚帝在位24年,虽处于内忧外困时期,但也有两次

人数在一百以上。

由此可见,随着统治需要,科举考试的规模不断扩大,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汉族文人仕辽,也刺激了契丹族人学习文化、参加科举的欲望。

(4)以契丹文字翻译大量汉文书籍。创制了契丹大、小字后,翻译汉文书籍大规模展开。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sup>[1] p.1211</sup>;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鞬及诗”<sup>[1] p.1303</sup>;萧韩家奴“又诏译诸书,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sup>[1] p.1450</sup>;“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行之”<sup>[1] p.1349</sup>;辽圣宗耶律隆绪“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sup>[10] p.57</sup>。

由于认识到发扬本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本民族青年进行文化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辽代统治者及一批有学识的契丹文人翻译了大量汉文书籍,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为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营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5)崇儒尊教,推动了汉文学学术宗教的振兴。为了加强统治,辽朝统治者不仅尊崇儒教,对道释二教也并加扶持,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sup>[1] p.1209</sup>《辽史》中相关的记载还有很多:

神册三年(918)五月(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sup>[1] p.13</sup>

四年(919)秋八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sup>[1] p.15</sup>

清宁元年(1055)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sup>[1] p.253</sup>

咸雍十年(1074)冬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sup>[1] p.276</sup>

大安二年(1086)春正月,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sup>[1] p.291</sup>

四年(1088)夏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sup>[1] p.296</sup>

四年五月,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sup>[1]</sup>

五年(1089)三月,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sup>[1] p.298</sup>

又道宗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sup>[1] p.267</sup>

四年(1068)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sup>[1] p.267</sup>

八年(1072)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sup>[1] p.273</sup>

八年秋七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sup>[1] p.274</sup>

大康元年(1075)三月,命皇太子写佛书。<sup>[1] p.276</sup>

四年(1076)秋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sup>[1] p.281</sup>

九年(1081)十一月,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sup>[1] p.289</sup>

辽代三教并行,除儒学外,佛教的发展也令人吃惊,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足可见佛教之大行其道。通过对佛经的翻译、颁行和研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辽代文化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辽代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契丹族文人的崛起,他们以杰出的表现而成为当之无愧的辽代文学的主体,不仅成为辽代文学、文化的核心人物,对后来同样由游牧民族所建的金元王朝的非汉族文人领衔文坛也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 [参 考 文 献]

[1]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沈括.侯真平.梦溪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 3 ] 周春. 辽诗话[ M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本, 第 1710 册 ) 2002.
- [ 4 ]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 二十五史补编·六[ M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55.
- [ 5 ] 黄虞稷, 瞿凤起, 潘景郑. 千顷堂书目[ M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 6 ] 厉鹗. 辽史拾遗[ M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丛书集成初编本 ), 1937.
- [ 7 ] 陈述. 全辽文[ M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2.
- [ 8 ] 赵翼, 黄寿成. 廿二史劄记[ M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 9 ] 张晶. 辽金诗史[ M ].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 10 ] 叶隆礼, 李西宁. 契丹国志[ M ]. 济南 : 齐鲁书社( 二十五别史 ), 2000.

[ 责任编辑 穹 旻 ]

##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HU Shu-hu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

**Abstract** : The Liao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nomadic tribe—Khitan that lived in the grassland in north China. The culture of Liao Dynasty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We can make a table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Liao literati on the basis of poems and essays collected in the local records written by the past dynastic scholars. There are some distinctive points in the table. Firstly, the literati who could stand for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Liao Dynasty were the Kuitan nationality. They were the main body of Liao Dynasty. Secondly, Kuitan literati had an obvious property—their ancestors got the ruling power of half China by using military forces.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uling the country than to developing culture, but from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culture, they supported and admired Confucian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greatly. In these better cultural surroundings, their offspring went on working and got greater achievements. At last, women writers of the Khitan tribe ha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hese women such as Xiao Guanyin, Xiao Sese are good representatives of Liao literature.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policy, which provides and guides the trend of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literature shows and promotes implementing the cultural policy. Liao took such measures to develop culture. First, it created Kuitan language. The ruler of Liao—Apoki ordered his ministers and some Han intellectuals to create big Khitan characters. Apoki's younger brother created small Khitan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afterwards. Second, it set up prefectural academies or national university to train Khitan people. These schools use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books to educate Khitan students. Thir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lso brought about great influences. Fourth, many book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translated into Khitan language. The rulers and Khitan intellectuals translated many Han books, which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Khitan's culture. Fifth, they began to respect Confucianism and other religions. The rulers advocated Confucianism strongly, and helped develop Taoism and Buddhism. Through translating, issuing and studying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Liao culture was promoted.

In short, the Liao Dynasty witnesse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ts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rising of kuitan literati, whos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over non-Han literati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established by nomadic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 Liao Dynasty ; Kuitan literati ; main body ; cultural system